

论邹韬奋的抗日救国主张

朱允兴 沈谦芳

邹韬奋(1895—1944)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面对深刻的民族危机,邹以笔墨为武器,挥洒着热血,倾献着精诚,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息。邹不仅是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和出版家,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宣传鼓动家。他留下了大量的抗日救国言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今天认真发掘和研究邹的抗日救国主张,不仅对于全面地研究邹韬奋,而且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都具有意义。

一

1926年10月,已到而立之年的邹韬奋接任了《生活周刊》的主编。1927年5月29日,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政治力与经济力的压迫》一文,首次表现出对中国前途的严重忧虑。他认为,我们中国受到外国的各种压迫,前途万分危险,应该想出方法来消除这种危险。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处今之世,要进中国于世界第一等的地位,除恢复我们祖宗强盛时代的道德智识和能力之外,还要加上欧美之所长。”^①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认同和宣扬,并非是他独创的见解。

就在他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实施吞并中国的既定国策。1928年4月,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向中国

^① 《生活周刊》2卷30期,1927年5月29日。以下凡是邹在他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均不注作者和篇名。

北方的发展，日本粗暴地出兵济南。5月3日，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大敌当前，对于已入国门，侮我同胞，掠我财富的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怎么办？当时的邹韬奋认定中国根本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条件，在救急方面，只能从抵制日货入手。他在《生活周刊》上号召人们坚决抵制日货，强调“对日本方面应有持久的经济绝交精神”，“只有这件事能使他们感觉苦痛”^①，同时，又劝告人们要“忍辱负重”，奋发图强。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扩大军事训练的范围；二、提高军用品的自造力；三、养成强有力的民众。^②他认为这些建议的实施必须在全国统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他把国家的统一看得高于一切，认为准备抗日的工作只能在国家统一后才能进行，“现在军阀快要灭亡，等到军阀灭亡之后，我们全国一致的共同目标便是要对付日本的侵略”。^③“中国未统一以前”，我们不可因济案而“分我们的兵力，当以全力完成北伐，对日本兵此次在济南的横暴侮辱，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为了“求得最后胜利”，“全国国民从今日起必须要下一个决心，于中国统一后，用十年苦功夫，积极为对日宣战的准备”。^④很明显，在他的思想中，尚不存在立即武装反击侵略者的意念。不仅如此，他还为中国所蒙受的耻辱作过这样的解说：“今日之辱……非今日之罪，亦非今日所能争。”他所希望的是“官民一心，力求振作与奋斗”，这样则“国事日理，国本日强，不但不至受辱，且不求荣而自荣……”。^⑤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后，又频频制造事端，加紧策划侵占我东北。1931年7月，日军制造了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日本又利用大兴安岭地区中国驻军

①④ 毕云程，《济南惨案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周刊》3卷27期，1928年5月20日。

②⑥ 《生活周刊》3卷29期，1928年6月3日。

③ 《生活周刊》3卷28期，1928年5月27日。

处死日本间谍的所谓“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中华民族日益深重的灾难，邹韬奋反对“过去数年内自相争夺，徒伤元气，不顾国防”的做法，呼吁“从此全国团结一致，积极努力于安内御外工作”。^①“我国全国上下应有彻底的觉悟，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勿彼此闭着眼睛终日钻在牛角尖里，专作鸡虫之争”。^②他表现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

总之，九一八事变以前，邹认为中国没有御敌之兵，“实力”乃准备之中的事，“经济绝交”则是抗敌的唯一有效武器。他把争取“最后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内的团结和官民的励精图治上，还没有看到民众的伟力和武装抗日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二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开始全面实施鲸吞我东北的预谋。数十万中国边防部队，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约束下，置东北三千里河山和三千万同胞于不顾，步步后撤。对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痛述“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③

他愤怒斥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为“极端无耻主义”^④，高度赞扬和实际支持奋起反击侵略者和人。马占山在黑龙江率孤军抗敌，名振天下。邹韬奋和同事们表示“以满腔热诚对马将军以及他的忠勇愤发为国效死的将士顶礼膜拜，致其无上敬意”。^⑤他主张应战，但又认为“主张应战，是认为死里求生的唯一办法，并不认为在战争本身我们有打胜仗的把握”。^⑥既

-
- ① 《生活周刊》6卷30期，1931年7月18日。
② 《生活周刊》6卷21期，1931年5月16日。
③ 《生活周刊》6卷40期，1931年9月26日。
④ 《生活周刊》6卷41期，1931年10月3日。
⑤ 《生活周刊》6卷47期，1931年11月14日。
⑥ 《生活周刊》6卷44期，1931年10月24日。

然“应战”没有“打胜仗的把握”，他认为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抗敌计划自有政府负责，就民众方面来说，还是应该坚决持久地拿起“经济绝交”这个“制敌的唯一武器”，同时对国内的团结和政府的外交予以“严厉监督”。^①

然而，“经济绝交”这个“制敌的唯一武器”阻止不了日本侵华的步伐。已造成东三省被占领的“既成事实”后，日本又转移兵锋于上海，接下来的便是对华北的蚕食。把武装抗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得到的却是沉痛的失望。无情的事实使邹韬奋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破灭了：在国事日非，外患深重的艰难岁月中，“任你东钻西窜，总脱不了惨然！我们中华民族难道就听任这样循环不绝的日在惨然之中吗？还是要转转毅然决然自拔的念头，跳出这个惨然的圈子？”^②一代爱国知识者的心在流血了，这是邹对现实绝望的哀鸣和深沉的思索！

是什么原因置中国于“惨然”的境地呢？通过反思，邹韬奋认识到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数年来政治之没有办法”。^③这种认识严重地动摇了邹依靠国民党抗日救国的原有主张，并促使他开始寻找新的救亡力量和新的救亡途径。此时的邹已把抗日救国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能否救国成了他评价一切“人物或集团”的标准，“凡能在事实上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都是我们国民所要拥护的人物或集团，否则虽是架子十足，宣言堂皇，在我们国民看来，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④他认为要救国必须“既有彻底的觉悟，复有努力的决心，尤有通盘筹算的计划和坚毅奋迈的执行”，如果政府不能应民众的这种希望，“那么这种误国的当局应为民众所不容，民众当群起而谋所以自救”。^⑤他对国民党当局

① 《生活周刊》6卷41期，1931年10月3日。

② 《生活周刊》7卷40期，1932年10月8日。

③ 《生活周刊》6卷40期，1931年9月2日。

④ 《生活周刊》7卷10期，1932年3月12日。

⑤ 《生活周刊》6卷42期，1931年10月10日。

压制言论自由，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行为十分愤慨，高呼：“大胆警告当局，政府如此积极的广播革命种子，所恃者不过几枝枪杆子，……民众为自卫及卫护民族计，随时有爆发的机会，起来拚命！”^①

邹韬奋苦苦地思索，几经选择，最后认定只有掌握武装和政权的民众才是卫国保族所可依靠的力量。1932年1月，他就国民党军队丢失锦州一事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对于过去事实的痛定思痛，“至少应得到一最大的教训，就是只有国民的心志和力量才真在卫国保族上着想，欲求但知自私自利的军阀官僚们卫国保族，等于缘木求鱼，是绝对无望的”。^②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他再次著文指出：“民众为着自身利益而反抗军阀混战，反抗帝国主义的压榨，除非把政权和武力放在民众手中，或放在确能为民众奋斗的集团手中，绝对没有便宜的路走。”^③1933年3月，他就汤玉麟逃失热河的“滑稽剧”指出，“愈益深刻的感到只有能代表民众的武力才真能抗敌，把国事交给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干，无论你存何希望，终是给你一个幻灭的结果”。^④由此可见，1932年以后邹韬奋的救国思想发生转变，对国民党政府的希望已经破灭，把抗日救亡的依靠力量逐渐放到民众身上。至于经济方面，“民众更是不论地位与能力，人人可以参加一分的力量，即下决心坚持抵制仇货到底”。^⑤这样，就民众方面而言，他已把原来的“经济绝交”同现在的武装“自救”结合起来了。他在1933年5月27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信箱”栏目中提出了自己新的主张：“横在我们面前的，‘已不是先安内后攘外’，或‘先攘外后安内’的问题，而是唤起广大的民众运动

① 《发活周刊》6卷49期，1931年11月28日。

② 《生活周刊》7卷3期，1932年1月23日。

③ 《生活周刊》7卷26期，1932年7月2日。

④ 《生活周刊》8卷10期，1933年3月11日。

⑤ 《生活周刊》7卷25期，1932年6月25日。

以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依附者的问题。”为了适应宣传上的需要，他把为民众运动进行“思想和意识的准备”，定为《生活周刊》“努力的方针”。他真正找到了“创造历史的动力”，并自觉地与之结合。

不过，这个时期的邹韬奋在由什么“集团”来领导民众进行卫国保族的斗争这个问题上依然是惘然的。他“深信中国要得救，要走上轨道，决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负起这个使命的，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计划周详，真心为民族前途大众福利而努力奋斗的集团，领导全国民众共同奋斗，才能负起这个重大的使命”。^①他在这里提到的“集团”，不难理解，即指“政党”。他虽觉得国民党靠不住了，但对共产党又了解得很少。他所要从事的是团结民众做整个的民族的抵抗，但是“什么集团在事实上能把这个重大的领导使命肩起来？”^②他不止一次地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询问。这个问题在他1933年7月出国之前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在没有找到领导抗日救国的核心力量的情况下，邹只是笼统地呼吁国内团结，一致对外，并初步地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自一·廿八祸变发生以来，记者即主张应一致对外，勿以对内分散对外的力量，但最低条件，须政府能与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努力于御侮救国”。^③为了夺取救亡的胜利，必须使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组成一强大的阵线，“凡是破坏一致抗日的阵线的，都是全国全民族的罪人，卫国的军人和卫国的民众应联合起来”。^④

对于外交问题，邹韬奋主张在大力增加“自救”“实力”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国际援助。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主张把东北问题交由国联裁决，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邹对此大

① 《生活周刊》8卷4期，1933年1月28日。

② 《生活周刊》8卷6期，1933年2月11日。

③ 《生活周刊》7卷10期，1932年3月12日。

④ 《生活周刊》7卷9期，1932年3月5日。

不以为然。他认为“国际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把持，无弱小民族伸冤之余地”，我们的关键是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实力，“自己毫无自救的努力而以倚赖外援为侥幸，决无希望可言”。^①“我国除准备自己抵抗，除准备自救外，没有第二条路走”。^②但是，邹并没有忽视发展海外关系。他认为中国应重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应打击面太大，“我们此时对外惟一目标，须认定对日，不可自增纠纷，失却他国同情，结果徒为当前暴敌树援”。^③九一八事变后，因为苏联谴责日本的强盗行为，他对苏联的印象有了初步的改变。《生活周刊》加强了对苏联的研究，并主张把苏联作为一个反侵略的朋友和它复交。

邹韬奋对未来的抗日战争也有过考虑。从战略上看，他和同事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开端。他曾作文提出：“国人应放大眼光，从今以后积极准备国防，勿酿内战，则三五年内东北所激成的世界大战……正是我们有比较的充分准备以完全恢复国权的机会。”^④他还看到了未来战争中中国的长处：就是日本占领了中国沿海，也算不了什么，中国“地大人众，日本一时吞并不了，地占不了，人杀不尽”。不过，他把未来的战争估计得太简单，认为“只须我们能坚持，至死不屈，不逾三月至六月，彼决不得不屈服了，乃得解决一切悬案，不必待三年五年而后可达目的”。^⑤在战术上，他认为应重用游击战的方法。他以东北小股义勇军扰袭敌后，使敌疲于奔命的行动为例说，“况我国果欲以实力收回失地，亦重在以小队偏锋作不断的随处袭击办法”。^⑥不过，他难免有点书生之见，认为如用野战法对付日

① 《生活周刊》6卷41期，1931年10月3日。

② 《生活周刊》6卷45期，1931年10月31日。

③ 《生活周刊》紧急临时增刊，1932年2月5日（第2号）。

④ 《生活周刊》7卷14期，1932年4月9日。

⑤ 《生活周刊》6卷44期，1931年10月24日。

⑥ 《生活周刊》6卷51期，1931年12月12日。

寇，则“只须能坚持一年半载，暴敌必束手待毙”。^①

总之，自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到1933年7月流亡海外，邹通过痛苦的思索和追求，找到了卫国保族的依靠力量和新的抗日途径。邹对统一战线、外交，对未来的战争都曾提出过自己的主张。尽管此期内邹的救国主张未必都很精当，尤其是还没有找到能够领导民众抗日救国的“集团”，但却表现出了炽热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的激情。

三

九一八事变后，邹政治思想日趋进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32年秋，国民党当局下令停止邮递《生活周刊》。1933年冬封闭《生活周刊》。在这期间，因为邹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的“黑名单”，同年7月，被迫流亡国外。

1933年7月到1935年8月，邹考察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并用大量的精力在伦敦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做了大量详尽的读书笔记。归国后，他把这些笔记加以整理翻译，得《读书偶译》一册。通过学习，邹对马、恩、列等革命思想家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都有了清楚的了解。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的：“我每想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无时不心向往之。”^②在国外期间，邹韬奋仍然思考着中华民族的前途，他认为：“最重要的，当然在致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而“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组织。”“中国的勤劳大众组织”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据回忆，邹在访美期间，曾与中共留美人士徐永焕接触，更

^① 《生活周刊》7卷3期，1932年1月23日。

韬奋，《读书偶译·开头的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初版。

加明确地表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获致。”当时他还同徐讨论了如何加入共产党的问题。^①邹韬奋终于在探索抗日救国的道路上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后，仍积极创办报刊（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春流亡香港，6月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同时编辑发行《生活日报星期增刊》，随后易名为《生活日报周刊》，8月迁上海，出版后又改名为《生活星期刊》，到年底被封），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共同抗日而奔走呼号。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他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②

这个时期，邹的抗日救国主张集中反映在1936年7月15日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性文章里。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实行全国总动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抗日救国“必然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全国各党各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上的各党各派“可以有不同主张”，“只要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互相宽容是联合战线的第一要义”。“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派所利用”。他们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实行全民抗战，呼吁各党各派停止内争，结成联合战线，一致抗日。这种抗日救国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和红军“回师通电”等文件上表明的抗日

① 徐永煥：《韬奋的共产主义思想》，载邹嘉驷编《忆韬奋》，学林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92页。

② 《韬奋文集》3卷，三联书店，1955年11月版，第341页。

救国主张基本一致，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曾致信支持。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中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心存疑虑。他们希望共产党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希望红军“立即停止袭击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希望共产党立即与“任意杀戮人民”的部队断绝关系等等，都可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信中就曾指出：“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还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① 鉴于此，毛泽东委托潘汉年与他们保持经常的接触。邹韬奋在美国时就想加入共产党，回国后，由于共产党中央转战到陕北，各地党的地下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他没能及时与党组织联系上，因而也就没办法加入共产党。这种中间派的色彩却给了他很好的保护，使得他能够长期在国统区战斗下去。

邹韬奋还具有世界眼光，到这时，他对统一战线这个问题的主张已臻完善。他在为建立广泛的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吹呼吁的同时，又在为建立国际反侵略阵线而大造舆论。他宣称：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得不尽量运用世界大势中有利于我们的各种条件”，“对于那些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或类于这样有意转移国人视线的主张，都要坚决地反对。”他认为：中国“加入英、法、苏等国家的和平阵营，并不是要抛弃自己的奋斗而去依赖别人”，这只是“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争取友军的一种策略”。^②

邹韬奋在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同时，对腐朽颓废、对外妥协退让的国民党政府则予以大胆的痛斥。他揭露并指责国民党政府对

① 毛泽东，1936年9月18日《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② 《生活星期刊》1卷，16号，1936年9月20日。

日的“敦睦邦交”政策，是“把敌人当着老子看待似的，秉承意旨，奴颜婢膝，打着嘴巴还要满口声明舒服，表示不但一点不敢存有反抗或叫冤的意思，而且还要格外的俯首下心装做亲热！”而这“和随处听到怪热闹的什么‘礼义廉耻’相去太远了！”^①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参加救国会，充分显示了他的爱国热忱。但是，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是有罪的，他因此总是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忌恨。他1935年到1936年所创办的报刊全都被封闭。至于他本人，1936年2月被迫流亡香港，8月份回到上海，12月22日与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同时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7月31日才获得释放。

在牢狱中，邹从不放过每一次可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的机会。最初当法国人在巡捕房向他问话时，他反问对方：“假如你们法国也被别国侵略，你立于国民地位，要不要起来主张抵抗侵略？”问得那个法国人无言以对。^②在租界法院候审时，他与看管他的法警们恳切交谈，说明国难的严重性和团结御侮的必要性。法警们听了他的谈话，知道他犯的是“爱国罪”，对他表示出真诚的同情，并且说：“你们的意思，做中国人的谁不赞成！”^③11月28日，邹被“移提”（引渡）到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他和战友们慷慨陈词，驳斥国民党当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并利用法庭为讲坛，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使旁听者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在监牢中还异常勤奋地读书写作，8个月中，著译了三十多万字的书稿。《二十年来的经历》是他在狱中著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此书最后一节《前途》中，他写道：“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起这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坚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捐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

① 《大众生活》创刊号，1935年11月16日。

② 《韬奋文集》3卷，第90页。

③ 《韬奋文集》3卷，第95页。

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正式开始。第二天，中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这个通电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国民党当局也在大敌当前的压迫下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转向抗日。这样，国共合作再次实现，全民抗战的高潮迅速形成。

面对新形势，出狱后的邹心情甚是愉悦，立即投入了战斗。他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抗战》及其前身《抵抗》、《全民抗战》和流亡香港后复刊的《大众生活》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反共内战的阴谋。在这期间，他的抗日救国主张突出地表现在争取民主政治以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

统一战线形成后，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高潮，但许多反对民主政治的人很快就跳了出来，散布种种谬论，以为民主与抗战是不相容的，公开鼓吹独裁统治。这种论调极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妨碍了全民抗战的展开，给抗战前途带来了阴影。对此，邹韬奋予以坚决的驳斥和理论上的澄清。他认为团结是胜利的基础。民主是团结的保障，“民主不但不与抗战不相容，而且是要增加抗战的力量的”。针对“国家至上”，“我们要牺牲各个人的自由”的论调，邹指出，“只有法西斯国家观，才把国家和人民强为划分开来”，“只有‘以民为主’的国家才能配得上‘至上’”。针对民主“只是散漫无政府状态的代名词”的论调，邹指出：“民主不但不妨碍集权，而且民主集权是当然的现象”，“民主与专制对立，并不与集权对立”。针对“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的论调，邹举出种种事实，证明这种叫嚣只不过是反民主的“挡箭牌”。总之，“无论那一种论调，归根到底一句：骨子里都是在

反民主。”^①

邹韬奋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实践中为了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作出了英勇的抗争。抗战初期，邹被国民党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使得他“有机会与抗日各党派共同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得到更多的实际的政治接触”。^②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五次次会议，他都参加了，共提交9个提案，主要内容为：要求保护民众团体，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保障人身自由等。一开始，他“怀着满腔热诚与希望，把自己看作努力代表民意的一个分子，欣然参加”。^③他认真准备每一个提案，并努力使它获得通过。但是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毫无实际的权力。由国民参政会通过提案，不管如何切合时需，很难得到实际的效果。残酷的事实粉碎了邹的希望后，他决定辞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职务，出走香港（1941年1月），想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④在任参政员期间，他曾参与和领导了“宪改运动”，但最后在国民党的高压和欺骗的双重打击下也告失败。通过国民参政会的斗争，邹更加认清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面目。

1939年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亡共之心不死，在日军攻势稍微减缓后，就频频掀起反共高潮，严重地影响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邹韬奋对此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大敌当前，不团结御侮而反自相残杀，只等于破坏抗战，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此外没有什么可得。”^⑤他呼吁团结：“要加速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必须更加巩固团结。”^⑥他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民众运动，开放言论自由，允许各抗日党派合法存在，

① 《抗战》三日刊，第37号，1938年1月16日。

② 《韬奋文集》3卷，168页。

③ 《韬奋文集》3卷，176页。

④ 《韬奋文集》3卷，165页。

⑤ 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58年1月版，358页。

⑥ 《全民抗战》周刊，151期，1940年12月21日。

尽快实现民主政治，从而克服一切引起统一战线内部摩擦的因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摩擦达到高峰，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倒退日益加剧。进步的抗日团体、报刊、书店横遭摧残，特务横行，进步人士频频失踪，恐怖笼罩着大后方。邹韬奋及一大批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被迫流亡香港或国外，但他们“虽身在海外，亦不愿自安于明哲保身，愿始终坚守文化岗位，追随海内外同胞之后，力争祖国之进步与光明！”他们表示，“不但对目前之流离与诽谤，视为无物，即令粉身碎骨，亦甘之如饴。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敌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①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17日，他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周刊。6月7日，他和茅盾、范长江等九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具体提出了全面抗战、巩固团结、实施民主等九条主张。邹韬奋在香港坚持战斗，直到香港沦陷后，才于194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转移到东江游击根据地。

1942年11月中旬，在共产党的安排下，邹韬奋由东江安全转移到苏中解放区。他在苏中、苏北根据地认真考察后，在给陈毅的信中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②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伤害。1943年2月中旬，他被迫秘密返沪就医。10月间，得知国民党调集大军围攻陕甘宁边区，他愤不可抑，在病榻上口授《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谴责国民党“这次对敌妥协，进攻共产党的策略，实是危害国家，荼毒人民的滔天罪行”，并表示“此次在敌后视察，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1944年6月，邹韬奋口授遗嘱，再次

① 《大众生活》，新4号，1941年6月7日。

②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4日。

强调在根据地看到了新中国光明的未来，并“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7月24日，伟大的爱国者邹韬奋逝世，辞别了一个烽火连天而又曙光初现的中国。

在抗战中，邹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共产党负责人的安排，他一直是“以中间派”的身份自觉地为党工作。1937年11月中旬，他准备由上海撤往内地，曾向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党组书记恳切地提出要求，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①12月下旬，到汉口后，又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对他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与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到重庆后，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周仍然要求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做工作，并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②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主动地向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请示。1941年2月，根据周的指示，他对生活书店及人员作转移安排。在他创办的书店和报刊编辑部里有许多共产党人，他们都相处得很好。他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多次与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畅谈考察观感，并郑重向刘提出了入党请求，他说：“现在我已经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露面，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希望同意我入党。”刘曾将此事向苏中区党委和华中局作了汇报。^③邹韬奋虽然在生前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死后由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是以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姿态为着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地战斗着。在抗战期间，他的抗日救国主张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完全一致了，实质上，他是在积极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① 顾小岚：《韬奋的宿愿》，《解放日报》，1980年7月1日。

② 刘景华：《周恩来与邹韬奋的友谊》，《光明日报》1979年7月24日。

③ 顾小岚：《韬奋的宿愿》，《解放日报》1980年7月1日。

综上所述，邹韬奋的抗日救国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九一八事变以前，他没有找到可靠的抗日力量，因此，他的抗日主张较为模糊。九一八事变后，邹对国民党的希望破灭了，开始寻找新的抗日救国力量：他发现了民众的伟力，并自觉地与之结合，走向了革命，接着又找到了能够领导民众抗日的“集团”——中国共产党，并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中看到了新中国光明的未来，从而也找到了自己最终的归宿。邹是个文化战士，他的抗日救国主张通过他主办的报刊在国统区传播，起到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正如周恩来在1945年9月12日《致韬奋家属的慰问信》中所指出的：“在他的笔底，培养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①

（作者单位：朱允兴，兰州大学历史系；沈谦芳，黑龙江省呼兰师范专科学校）

^① 《经历》，第406页，附录。